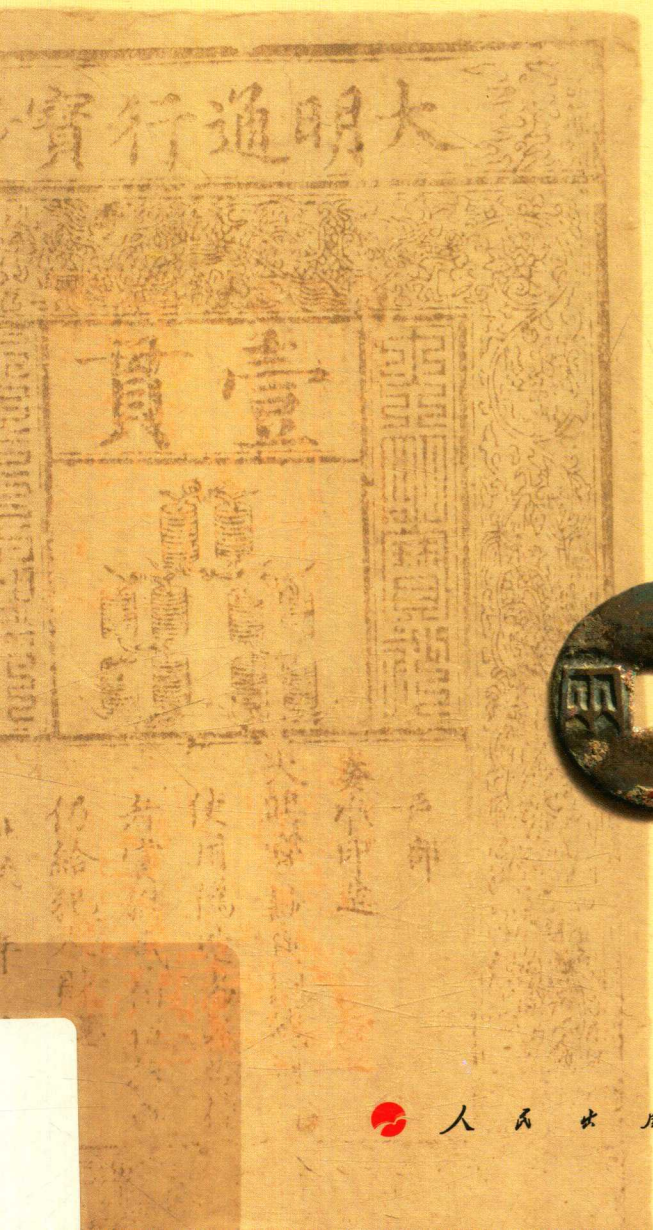


# 传统中国的 货币与财政

Currency and Finance  
of Imperial China

何平◎著



人民出版社



传统中国的  
货币与财政

何平◎著

Currency and Finance  
of Imperial China

责任编辑:方国根 郭彦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中国的货币与财政/何平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5

ISBN 978-7-01-020403-1

I. ①传… II. ①何… III. ①货币史-研究-中国-古代 ②财政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F822.9 ②F8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8648 号

## 传统中国的货币与财政

CHUANTONG ZHONGGUO DE HUOBI YU CAIZHENG

何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8.5

字数:422 千字

ISBN 978-7-01-020403-1 定价:8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前 言

本书是我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长期学习和思考的心得。它既是配合特定的科研任务的专题研究，也是聚焦于传统中国社会货币问题、财政问题与货币—财政关系问题具有系统性的一部专著。

1991 年 7 月起，我开启了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金融教研室的从教生涯。如果将那一年作为一个观察时点，在同一个教研室工作的同事（甚至包括国际金融教研室），今天仍在岗位上工作的，除了学校终身教授黄达先生（现在中国人民大学仅有的两位终身教授之一）以外，我是硕果仅存的一位。那是一个新的读书无用论流行的时期，在高校任教十分清贫，筒子楼住宿持续了十年，2000 年以前，本院自身培养的全日制金融学博士毕业生，没有一人留下任教。我到金融教研室任教，最初的任务是担任本科“中国货币金融史”和“货币银行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按照科研与教学互为促进的思路，我理应率先出版一本货币金融史的专著以支撑课程教学。然而，当我在清史名家王思治先生指导下从事清代经济史方向的博士论文写作时，发现就清代货币史资料而言，“清代统治者对货币问题的处理仍然处在十分朴素的阶段。虽有丰富的档案资料可供整理，其理论提炼价值尚形缺乏，论题过于偏狭”<sup>①</sup>。我的导师既严厉又开明，在选题问题上，他特别提示要与我自身的工作相结合，以便收到相得益彰之效。所以，从我当时的认识出发，便选择了清代前期财政赋税问题作为首发的研究主题。这样，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在经济史方面的论文都集中在财政与赋税政策及其相关问题上。

---

<sup>①</sup> 何平：《清代赋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6 页。

然而，我在学校的教学任务不仅限于货币金融史。自1993年春季学期开始承担货币银行学（今天的“金融学”）本科课程教学，1998年始承担硕士学位生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2003年开设中日金融的结构与变革硕士课程，2015年开设金融专业硕士互联网模块货币金融史课程，2018年秋季开设硕博连读货币思想史课程。在学校教师培训中心主导下，2015年连续4年主持了每年一学期的名师沙龙“中国货币金融的历史与思想”。在学生培养方面，2001年开始指导金融学硕士研究生、2005年开始指导金融学博士研究生以迄于今，我的大量精力都倾注在当代金融理论的学习和金融实践的关注上。这个就志趣而言分心的工作，却是我的衣食之源。在不断拓展中，磕磕碰碰，自己唯一能够主动把握的事务，就是从不放弃学习，不断摸索。1991—1992年在硕士生课堂上，向黄达先生、王传纶先生学习。在工作和生活中，同事同行耳濡目染，相互切磋，没有学源年龄任何顾虑地全方位请教。好在金融学科（当时称货币银行学）在我从教的初始阶段，也正处在从计划体制的学科体系向吸纳西方前沿理论进行重新组合的阶段。我年轻无忌，积极拥抱新知，并不时以孔夫子的述而不作以自况。然而，面对学生特别是金融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和方法，为此我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进行知识结构的重塑。

正如在英格兰银行工作多年的伦敦经济学院古德哈特教授所说：“从其他专业转向经济学有一个共同趋势，即主要是两个来源：第一个是数学和物理学，第二个是历史学，再加上其他社会科学和人类学。这两类不相同学科的相互作用提供了经济学中多数个人的创造性思想。如果不了解制度/社会/政治背景，数学只会造成空洞的形式主义。如果没有一个坚实的理论核心，历史和制度方面的知识则仅仅是冗长、模糊和通常是错误的文字表述。”<sup>①</sup>将经济金融理论和经济历史变迁的细节考察结合起来，便成为我的重要学术路线。近年将金融学领域的关注点逐渐聚焦在国际货币体系与人民币

---

<sup>①</sup> [英] 查尔斯·古德哈特 (Charles Goodhart): 《古德哈特货币经济学文集》(上卷), 康以同等译, 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版, 第4页。

的国际使用、金融安全网与存款保险制度等主题的探索上。正是在对当今理论有了一定认识之后，重新阅读历史材料，我才发现中国货币与金融的历史资源不仅是重建货币理论的有益材料，而且它本身就必然引导出货币金融理论的全新内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对中国历史时期的重要货币和金融问题进行解读，得到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下面从本书涉及的主题出发，提出若干问题供同行思考，同时也有助于理解本书的研究取向。

## 一、传统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研究三问

我们要有效地解读长时段中国货币金融的内容及隐含的意义，下面的三个设问恐怕难以回避。

一问：货币金融史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为今天的理论建设提供借鉴？

关于货币与信用的关系，是今天货币经济学中一个不容易弄清楚的问题，宏观经济学者对此进行了繁复抽象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耶鲁大学教授马丁·舒贝克（Martin Shubik）三卷本的《货币和金融机构理论》都是在解读这个问题。他称：

交换经济有效运作的技术和逻辑要求相结合，要求使用轻易可识别、简单和普遍接受的交换手段。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共同使得市场结构不完备成为可能。缺乏信任要么需要其内在价值充当其自身担保的商品货币，要么在使用法定货币的情况下，需要接受货币为信任或价值的社会代用品的社会及其政府的充分执行和接受的法律和习俗。私人信用进一步复杂化了信任、习俗和法律之网。货币与信用的存在是系统动态学的属性。在一个处于完美均衡的世界中，货币和信用无须存在。

如果一个社会采用商品货币，那么关于供给、生产成本、耐用性和其他因素的现实问题会导致短缺。有几种方法可供社会来解决货币性媒介的短缺，包括引入信用、发明诸如汇票之类的工具、提高货币

存量的流通速度和改变市场结构。信用的引入要求指定信用发行人、描述信用的本质，以及给出条件来规定如果债务人或债权人未能履行承诺的后果。从而很多取决于信息处理、风险评估和信用评价的问题就出现了。<sup>①</sup>

货币和金融机构使得经济可以被作为联系松散的系统来管理。与联系紧密的系统相比，联系松散的系统被更好地调整以对误差进行吸收和调整。在经济动态学发展中，宏观经济规划和控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系统如何对不完美的预测做出反应。……信息和准确性要求似乎是不合理的，所有实际可行的体制好像都“蒙混过关”。社会对官僚体制、公平和效率有明确的态度，其社会和政治方面决定着何种程度的蒙混过关是可接受的。最多，大部分行为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局部最优化的。

……构建抽象的宏观经济理论时必须考虑的成分比一般均衡所需的成分更为复杂。但是，虽然一般均衡本质上是无制度和非历史的，但宏观经济理论本质上是有制度的。因其既对政治，也对社会开放，从而有受历史和社会影响的动态学。<sup>②</sup>

只要有足够的耐心，适应这种“蒙混过关”的语言转换，还是能够明白马丁·舒贝克教授对于货币与信用的区分与解读。在他看来，信用是一种债权债务的契约，要求信用发行人、信用的性质以及债务人或债权人履行承诺的条件和违约后果等制度设施为其担保。而最简单的交换手段商品货币，是依赖其内在价值为自身担保。尽管他提到了理解这些范畴的历史视角，但没有具体的陈述，仍属抽象论述。

---

① [美] 马丁·舒贝克：《货币和金融机构理论》（第3卷），孙国伟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② [美] 马丁·舒贝克：《货币和金融机构理论》（第3卷），孙国伟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10页。

在我们关于货币与信用关系的讨论中，也有这样的表达：“货币和信用是不同的范畴，货币代表了过去的价值，而信用则是在货币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借贷活动对既有资源的跨期配置，因此，信用代表的是未来不确定的价值。信用扩张一方面缓解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融资约束’，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形成经济波动。”<sup>①</sup>

要理解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周期，货币和信用的概念厘清就十分必要。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债务危机。危机之前，个人、企业和政府都在大量借债加杠杆，信用扩张十分显著。如果我们将两者的关系表达为传统的货币数量和体现为信用的债务规模，那么，从经济活动的阶段发展来看，我们也可以说初始阶段是货币与实物的关系，货币是用以发挥流通手段职能，服务于市场交换。在我们生活的信用货币时代，在货币供给的产出效应理念作用下，由于潜在资源和可利用资源存在，人们充分认可货币供给可能引致产出的增加，大量地投放信贷，内生地创造出更多的信用。这种信用本来就是货币，但是当投放的信贷没有创造出新的产出时，这些债务就减值虚悬，没有商品与它对应，货币存量也就减少了。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点，整个社会财富和既有货币数量是对应的。但是经济在循环运转过程当中，新增信贷代表着很多预期的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按时间维度来说，从既有货币数量的角度观察经济问题，是事后的。要事前对经济活动进行前瞻性的观察，就要看信用，看整个债务规模是否真正发挥了产出效应。<sup>②</sup>在这样思考的延长线上，我们会清楚，货币是用来交易已经生产出的产品，所谓信用中那大于M1的部分就是虚悬的我们日常理解的债务，它的动向将直接影响经济的稳定。这里的关键在于将作为货币的债务（信用货币条件下，货币本身就是信用活动的载体）和以信用形式体现出来的真正债务区别开来，前者服务于交易存量，后者服务于经济的未来预期产出。

但是，这样的说明仍嫌抽象。耶鲁大学教授加里·B.戈顿（Gary B.

① 瞿强：《资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② 参见瞿强：《货币与信用：疑问与思考》，载吴晓求主编：《全球视野下的金融学科发展》，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版，第32—41页。

Gorton) 在解读金融危机的成因时, 透彻地分析了通过银行体系投放的信用及其与货币的关系。他称:

在银行券时代, “无论财富是何种形式的, 金融危机都是由于银行债务持有者因为恐慌而大量需求现金所导致的。在内战之前, 美国人使用私人银行发行的货币来交易, 如果他们不想要这些货币, 就会去银行兑换硬币, 也就是金或者银的硬币。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的话, 就会发生系统性银行恐慌”<sup>①</sup>。

在银行券和存款货币为内容的信用货币时代, “银行输出了短期负债, 这些负债以抵押品作为基础, 这些抵押品可能是银行的资产也可能是某些债券。但是私人部门是不可能创造出无风险抵押品的, 因为当存款者质疑抵押品的质量时, 它就变得很脆弱, 有不能续借的风险。金融危机最初始的形式就是银行债务的撤回, 银行挤兑, 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问题”<sup>②</sup>。

戈顿教授透彻地分析了美国历史上几次金融危机所面对的具有历史阶段意义的不同形式的银行货币。<sup>③</sup>1857 年银行顾客要求用金银来兑换银行券和活期存款。1863 年《国民银行法》开启了国民银行时代, 在这个时期, 如同 1907 年遍布美国的金融恐慌, 存款者要求用国民银行券来兑换他们持有的支票账户。银行不能满足客户金银和国民银行券的要求, 引起群体挤兑。而在 2007 年和 2008 年的恐慌中, 回购、商业票据和 PB 业务清算被要求兑换。因为这一次挤兑出现在大户市场上, 也就是公司挤兑公司, 对大多数人而言不太明显。从货币范畴的视角而言, 在脱离了实体货币进入银行信用货币时代, 货币的发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银行发行货币需要无风险的抵押品。自由银行时代, 以州政府债券作为发行货币的抵押品, 其违约导致了

---

① [美] 加里·B. 戈顿:《对危机的误读——我们为何无法发现其来临》, 纪晓晴等译,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6 页。

② [美] 加里·B. 戈顿:《对危机的误读——我们为何无法发现其来临》, 纪晓晴等译,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9 页。

③ 参见 [美] 加里·B. 戈顿:《对危机的误读——我们为何无法发现其来临》, 纪晓晴等译,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11—46 页。

挤兑。《国民银行法》以联邦债券作为抵押品发行银行券，提高了银行券的信用品质，然而活期存款这种新的货币形式被忽视，银行利用这个漏洞进行信用扩张，酿成以支票挤兑国民银行券的金融危机。1933年美国银行法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堵住了存款货币投放可能带来的危机，形成迄至2008年的银行体系长期平稳期。然而，回购、商业票据和PB业务清算又在监管之外。戈顿教授的历史视角的理论分析，清晰地解释了货币与信用的关联，信用是远离和超出原初由实体货币作为银行信贷载体的那部分信贷投放量。回到货币形态的起始点，我们自认为莫测高深的问题就可能一目了然，本书关于中国货币发展历程的相关主题论述，正是对中国案例的解读。

饶有兴味的是，货币形态的起始点，也就是货币的起源和本质，今天也成了一个存疑的问题，同时这也关乎货币和信用的关系。马克思为代表的商品货币说，定义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在这两个职能的基础上，衍生出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来。最近，由于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债：第一个5000年》<sup>①</sup>的翻译出版，引发了人们对于货币的债务起源说和可转让信用说的重新思考。韦森教授在多个场合指出这种货币起源论的合理性。他指出：

从历史上来看，当世界各国历朝历代的官员、军人、侍从、工匠从王室到政府拿到的“货币薪酬”，当商业银行和钱庄从政府的司库或央行借到“法币”或“基础货币”转而借贷给其他商家和个人时，只不过是把政府欠全社会的债和可转让信用，转到下一个债务人那里而已。而人类社会市场运行，从表层来看是商品的买卖，是产权的让渡，从货币的债务和转让信用的本质来看不过是通过记账货币、铸币、纸币和电脑数字货币来不断地清偿债务而已。

如果从货币的可转让信用和债务的本质来看待货币，我们不但会发现任何国家和朝代的政府除了从社会中征各种各样的税和费之外，

---

<sup>①</sup> [美] 大卫·格雷伯：《债：第一个5000年》，董子云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还通过铸造、印刷和电脑网络投放基础货币来征一种铸币税，或者换个角度看，是政府欠全社会一种不必归还的债。如果用货币和债的本质来看待各国央行基础货币，那就会发现，每一块货币都是央行以及背后的政府欠社会的一元债。<sup>①</sup>

这样一些描述，与货币银行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偏离。在黄达主编的教科书里<sup>②</sup>，对本来作为教师备课背景知识的关乎货币与信用关系的金融范畴，设立了专章进行论述，可见其用心良苦和不容忽视之重要性。我们知道，其要义在于，商品货币等实体货币（hand-in-hand）与信用的关系，是偶然的和临时的。当那几枚货币用于借贷时，就有了联系，不用于借贷时，与信用便没有关系。所以，从总体上看，商品货币与信用没有必然的联系。与此相对，在信用货币条件下，货币与信用的关系却截然不同。任何信用货币（现钞和存款货币）都是银行信贷活动的结果，信用的扩张和收缩直接体现为货币供给的扩张与收缩。这时，货币本身就是信用工具，尽管有前述货币经济学更加深入的解读。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货币与信用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新的范畴——“金融”。在此条件下，便有银行体系的信用货币创造，通过央行的基础货币和商业银行体系经营过程中的信贷活动，倍数创造出全社会经济生活中使用的信用货币。<sup>③</sup>这种特定的货币条件和精妙机制，是货币银行学（金融学）最核心理论基石。

所以，不能简单地将自古以来的实体货币（诸如铜钱、金、银，以及牛、羊、香烟等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商品货币之类）与今天的信用货币（主

① 韦森：《货币的本质再反思》，《财经问题研究》2016年第10期。并参见韦森：《从货币的起源看货币的本质：历史与现实》，《政治经济学评论》第7卷第5期。

② 参见黄达、张杰编著：《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9—106页。

③ 有人试图从银行运营的角度重新解读今天信用货币创造的机制，结果喜忧参半。要害在于不时用“现金”代替“现金+存款货币”的银行贷款的所有内容，同时不能透彻地理解黄达教授《金融学》教科书中关于信用货币创造经典的系统论述，陷于银行具体运行的局部真相（丝毫不谈转账结算的重要功能以及货币乘数），不适应抽象思维的理论提炼方式。参见孙国峰：《信用货币制度下的货币创造和银行运行》，《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

权国家中央银行券体现的现金与存款货币之和)混为一谈。其价值依据,前者依赖于实体货币本身作为商品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后者依托于央行货币政策维持的货币购买力。信用货币性质的法定货币这种抽象符号的价值,不是那一张纸的成本,而是类如中国古人所谓“万物为本”的货币观所主张的,在交换各种商品(万物)中,相对化地在交换到的相应商品上体现出来。信用货币的债务凭据是形式,其本质是央行制度保证的、与具有使用价值的各种商品替换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信用货币的价值基础,是央行的制度设施,具体地,是“万物为本”的商品替换保证。金本位制下,人们相信银行券,是因为人们能随时兑换到金银货币本身。今天人们相信主权货币这种不兑现的中央银行券和存款货币,因为它可以买到各种商品。这就是3岁的小孩看到有人撕毁钞票大哭的原因,原来他了解用钱买糖的事实。

另外,货币的债务起源说,从认识论角度来说,颇有点“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古史辨派的思路。从今天熟悉的信用货币的现实和知识出发,去寻找和强化对考古与历史材料的解读。实际上,我们从这种主张产生的时间上就可以提出质疑。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的那个时代、司马迁的那个时代,都主张“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生焉”?不用说,是他们总结历史经验和从生活体验出发来作出的判断。而主张货币债务起源说最早的苏格兰经济学家麦克劳德(Henry Dunning Macleod, 1821),以及后来的凯恩斯、弗里德曼和曼昆这些经济学家,均是纸币在17世纪传入欧洲之后、信用货币大行其道时代的人物,其主张自然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至于说雅浦岛(Yap)上的石轮“费币”,它是一种具有货币特性的实物在社区共识下的建制,丝毫不影响商品交换起源说的成立。债务是物资使用权的转移,它是对余缺的调剂方式之一。用什么偿还债务,使用随意的具体实物,还是统一的特定实物?债务起源说和商品交易起源说,被借贷活动和交易活动两者何者为先的问题所误导。如果是信用活动的借出与偿还为同一实物,便不必促成货币的诞生。如果债务的偿还需要一种共同的实物,那么这种实物的价值是如何确定的?它只能在两种不同商品的交换、所有权转移中,相对化地体现出来。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为债务的记录和清偿寻找到同一的

工具，而不是债务个别的空洞的转移。货币的债务起源论隐含着价值尺度早已成立的先念假定，不啻同语反复。

可见，货币与信用的关系，由于货币的债务起源说更加复杂化。我们认为，问题在于将债务关系体现出来的经济关系及其解决手段与载体混淆起来了。如果用货币标价和清算，实物债务的形成，如同今天的商业信用一样，它是借贷关系和买卖关系的统一。我们可以说货币和信用是同源的，都是私有制诞生以后的产物。但是，两者何者为先在各地可能不同，但从货币产生的经典表达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在物物交换阶段就已经有了债务关系，其清偿完全可以不需要货币。但是，基于交易活动产生的货币一旦出现，就可以用货币来结清债务。杰文斯在讨论货币的“价值标准”职能时的论述，也许更加合理地描述了货币与信用的关系：

借债的人也可能需要若干种不同的物品，所需的这些东西不大可能会从一个人那里全部借到。于是，用一个普遍承认的、其价值几乎不大变动的商品来完成借债和放贷两种行为的便利性就油然而生了。凡签订合同并且根据合同他将在未来的某一天得到某种东西的人，都会希望得到保证，他未来将得到的商品的价值大概也能如今日一样。这种商品通常就是目前所使用的货币，并且货币于是就将承担起一种价值标准的职能。我们一定不要设想那个承担着价值标准职能的物质，其价值真的是不会变化的，而仅仅可以这样去设想，该种物质被选用来作为一种价值尺度，未来的偿债价值多少要根据这个尺度去进行调整。人们须牢记，价值只是所交换物质间的数量比率。可以肯定，相对于另一种商品，任何物质都不会永远保持完全相同的价值。但那是当然的，在选择作为价值标准的物品时，人们都希望被选中的东西看上去很有可能会继续以近乎不变的比率去与其他许多商品进行交换。<sup>①</sup>

① [英]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货币与交换机制》，佟宪国译，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14 页。

正是在以货币为债权债务计价的情形下，即使今天仍然存在着实物借贷，我们可以说今天的经济属于信用经济。实物借贷是可以用货币来计价的。

正是历史视角的分析，让我们能真实地理解真实世界的面貌和经济金融理论的缺失，戈顿教授在前引专著的第七章对“脱离历史的经济理论”设立专章进行了批评。

二问：体现传统中国货币金融基本特色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这里举几个并不排斥各个时期各种专题研究的主题，供大家思考。

其一，中国统一货币及货币使用的真相如何？

从制度史来看，秦始皇时期发行半两钱便开启了全国统一货币的时代，其后在铜钱制度上，先后经历了公元前 113 年汉武帝开启的五铢钱时代和公元 621 年唐初高祖开启以迄 1911 年清朝灭亡的通宝钱时代。但是，从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出发，或者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中国没有统一货币，实际的流通状况是多种货币的互补并存，“一个国家一种货币”（1935 年的法币改革）的时代远未到来，本位问题尚不存在。

关于这一点，也是黑田明伸教授《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一书的最大贡献。他的专著在日本学界都号称难读，原因在于平实严密的历史叙述中贯穿着宏大的理论构架。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在我看来，这本专著是以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的概念框架为出发点，以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对话坐标的理论预设，以历史学的叙事方式给予表达的著作。由于历史上的国家无力全方位提供有效的货币供给，各个本地社区便形成自律的货币使用机制。由于在中国境内存在着地区间、不同市场层次间劳动和资本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形，多重货币的并存流通成为事实。这样，那种试图简单换算加总各种货币得出诸如历史时期 GDP 数据的想法，最终只能是数字游戏。只是到了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本位制为基础的“一国一通货”的时代才到来。黑田教授吸取中国学者在货币层次结构等多方面的学术积累，利用他在经济理论上的知识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将中国货币金融的历史资源和西方的货币金融发展历程结合起来，提出了富有真知灼见的学术创见。可以说，他在利用中国货币金融的历史与思想资源

以丰富和发展货币理论方面，迈出了可喜的重要一步。

这里还要顺便提及，在西汉初年并不存在货币的非国家化带来经济复苏的历史事实。这种判断是误解了西汉社会经济的性质，那时的社会，即使是铜钱也仅只有极少数的社会成员使用，应当限于城市市民等普通民众。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功能投射到西汉的环境，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以今拟古，属于“时代错误”。同时，论证方式将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混为一谈，随意将两种历史现象混搭比对，这是近年经济学研究常常易犯的一个错误。此外，对基本的逻辑关系缺乏合理的判断，理论概念不明，“称衡钱”既然存在，说明钱币的标准必须统一，就不是哈耶克式的竞争并存货币，而是金本位制时代的统一货币内涵。穿越古今，试图利用误读的数据材料，构建理论模型，恐怕不仅没有实现理论创新，还会引致域外学者更加轻视中国历史资源的提取。

其二，为什么中国纸币没有发展为信用货币？其中包括中国“钱荒”的解决方式与信用货币的缺失。

中国是纸币的发明国度，再过几年就是官方纸币发行千年纪念了。对纸币问题的探索，由于实体货币有限性所固有的缺陷，唐代开始便出现了具有政策意义的“钱荒”，进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长期历史的发展来看，对此问题解决方式的不同，形成了近代中国和西方的分野。本书“短陌”、“纸币”相关各章，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纸币一章，更是自2017年夏天起，为了从历史角度解读比特币是否能成为货币而进行的尝试性的学术思考。

我主张古今东西的立体比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S. 罗格夫(Kenneth S. Rogoff)在最近的著作中，对纸币的命运和现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我们的社会中，现金未来的地位这一问题极度重要，再也不能将其冷落在货币经济学的犄角旮旯而熟视无睹。”<sup>①</sup>就细节而言，关于铸币和

---

① [美] 肯尼斯·S. 罗格夫：《无现金社会：货币的未来》，纪晓峰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

纸币的知识，出口转内销之后，错漏误置的所在多有，比如说：

有证据表明，中国独立于西方文明发展出了自己的硬币体系，尽管两者在出现的先后顺序上还存在着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对“硬币”的定义，以及早期的私人硬币是否可以被计量。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 Ferguson）向西方世界清楚地展示了两者的先后顺序，他认为，直到公元前 221 年，中国在秦帝国的秦始皇时代才第一次有了标准划一的青铜铸币，并在整个帝国内推广使用。

弗格森的描述显然是对中国货币历史缺乏认识的浮泛之论，误导域外对中国货币历史的正确认识。关于元代的中统钞，文中称：

当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 1260 年成为元朝的皇帝时，之前发行的地方性纸币都已变得几乎一钱不值。他们将之收回并替换为一种全国性的银圆券，这些银圆券具有特别的特征，如果将之向官方兑换现银时，银圆券持有者只能拿到相当于面值一半的白银。（在第十章中，忽必烈提出来的这种在纸币和官定价值之间设定差异的想法，在艾斯勒-布伊特-金博尔 [Eisler-Buiter-Kimball] 实施负利率的天才计划中得以重现）不同于之前发行的很多票据，忽必烈时期所发行的票据不设定到期日。<sup>①</sup>

这里酷似没有文化的金山式翻译，失实的汉语转换让我们对元朝出现“银圆券”的表达十分惊奇。而关于将纸币与官定价值之间设定的差异，看成今天负利率的先驱，则是罗格夫本人不熟悉或者误读中国文献所致。相关内容在我这本书第三章的陈述中，一目了然。但这种古今互证的思路，无疑

---

① [美] 肯尼斯·S. 罗格夫：《无现金社会：货币的未来》，纪晓峰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8 页。

是认识和辨析问题的重要方法，人体的解剖，有利于猿体的认识。

饶有兴味的是，作为北宋四川以解决铁钱携带繁重而发行的交子以大面额作为自身的优势胜出，在罗格夫这里，却要论证“由于大额纸币将会逐渐被淘汰，因此为了使得大规模携带现金更加困难，即使尚存的小面额货币也应当被替换为耐用性更好的重一些的硬币”。<sup>①</sup>

罗格夫提出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个逐步取消大部分纸币的方案”，其宏观经济学上的理由重在扫清实施负利率货币政策的障碍。而其他的理由，则反过来对于中国宋代初始纸币诞生动因的认识，具有重要启示。我们来看他提出的方案所遵循的三个原则，其中第一个首要的原则，“是为了让那些匿名的、无法追踪的交易再行大规模开展变得更加困难。相应地，取消现金是旨在增加那些秘密运输并储存大额现金的行为的难度。这一想法是为了减少现金使用在逃税或非法活动中的大量使用。通常而言，至少在发达经济体中，大宗合法交易中的现金使用已经日益减少，必要性也日渐降低”<sup>②</sup>。第二个原则是过渡的速度要放慢。第三个原则，是对那些贫穷而没有银行账户的民众提供免费的基础存款账户（或者未来出现的等价媒介），并配备智能手机。而他提出的《实现取消纸币的长期方案》，除了“（2）全民金融普惠”、“（3）隐私”、“（4）实时清算”外，最为重要的第（1）条“逐步取消纸币”，具体内容是：

逐步将所有的纸币取消，先从 50 美元及以上面值的纸币（或者等值的外国纸币）开始，然后再取消 20 美元纸币，只留下 1 美元、5 美元以及 10 美元（视情况而定）纸币。这些小面额纸币被允许长期流通。在最后阶段，使用等面值足重的硬币来代替小面额纸币。<sup>③</sup>

① [美] 肯尼斯·S. 罗格夫：《无现金社会：货币的未来》，纪晓峰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7 页。

② [美] 肯尼斯·S. 罗格夫：《无现金社会：货币的未来》，纪晓峰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75 页。

③ [美] 肯尼斯·S. 罗格夫：《无现金社会：货币的未来》，纪晓峰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77 页。